

8124
0071/882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
思想形成的史的考察**

——兼论这一思想形成的意义

曹 居 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基本实践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形成了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本文认为毛泽东形成这一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

大革命时期，党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革命经验并在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始终将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农民运动虽有较大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未形成高潮。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有不少在当时是极为深刻的论述，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形成尖锐的对立。但因历史条件所限，他一直未能将农民问题看作民主革命的实质和阶级基础，而视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配合和辅助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走向农村，走上了依靠农民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对农民的自然属性形成了完整的认识，正视农民已成为革命队伍主体的现实，逐步树立了相信农民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毛泽东在理论上解决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与农民主力军之间的关系，在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了农民主力军思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的形成为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突破性贡献。

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形成的史的考察

——兼论这一思想形成的意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基本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①笔者不敢苟同，认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才树立了这一思想。本文试图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过程作一粗略的考察，就教于革命前辈和学术界。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农联盟的光辉思想，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普遍遵循的规律。但东西方革命因国情不同及革命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的差异，革命所倚重的主要力量则有所不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农民及其它革命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人民军队由穿起军装的农民组成，党的基础的大部分由农民出身的分子组成，农民群众是革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基本源泉。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场农民革命。与此相适应，党应以农民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原则，这是中国革命有别于西方革命的最基本最显著的特色。

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一基本特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在革命的伊始开端就认识到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为探索中国革命特殊的发展规律，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毛泽东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与党探索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新道路的实践密不可分。农民主力军思想与新道路理论相辅相成，二者互为成立的前提和条件。农民主力军思想的形成是新道路理论产生的重要

前提和题中应有之物，新道路理论又是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本质说明。离开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就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农民在革命中的战略地位，也无由科学地说明中国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有别于西方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实质。因此，我们必须在与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的联中考察毛泽东树立农民主力军思想的过程。树立相信农民、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必须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作用与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能否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是衡量农民主力军思想是否形成的一个显著标志。

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的形成是革命实践推动的结果，这一思想一经确立又在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党来不及进行更多的理论建设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特殊的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中国革命特有的发展规律。

依靠什么力量进行革命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二大”作出了以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决定。对于农民问题，大会虽然提出了工农“握手革命”^②的口号，但认识十分肤浅。

1925年，党的“四大”对农民问题得出了不少正确认识。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③。很明显，“四大”第一次将农民问题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是认识上的进步。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失败后，党认识到了寻找同盟军的必要性并为之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当时把主要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四大”主要是从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角度论述农民运动的必要性的，并没有把农民问题视为民主革命的实

质和阶级基础。

在这一时期，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运动；另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只强调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认为农民无知识、不集中、散慢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两种倾向的共同点都是忽视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漠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尤其是陈独秀的错误思想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影响至深。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虽然早年就有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但在他看来，“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④。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根据本人的回忆，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是从1925年开始的。^⑤

1925年春天，毛泽东曾在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同年，他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集中力量领导全国农运。作为这段时间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1926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等文。他回忆道：“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地分道扬镳了”。^⑥

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⑦，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是一切反动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并提出了“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号召。

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的发动，视“大地主”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较之当时把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国民革命对象的一般认识深刻了些。但他并未将整个地主阶级作为内外反动势力统治的基础看待，没有富农这一概念。他当时虽然对资产阶级作了深刻分析，却未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区别开来，视大地主军阀为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为中产阶级。同时，毛泽东在提到中国革命这一概念时，多指民族革命运动，提到革命对象时，又多指帝国主义，这就容易忽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主要任务，即反对封建主义。这种状况说明，毛泽东此时

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总起来讲是不深刻的，不少概念又是模糊的。

1926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广农运的勃兴，国民党右派的夺权进攻及中共领导机关的妥协退让，构成了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希望与危机并存的画面。这年五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11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全国农运工作。这期间，他还实地作了不少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以及在农讲所的授课内容中。

在这些著述中，毛泽东重点论述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⑨的道理。其理由主要有五点。第一、农民是全国的基本群众。“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有80%，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国民革命要联合工农商学兵共同革命，对于农民这支大军“尤不可抛掉”^⑩，否则工人阶级就变成了孤军；第二、农民是生产主力军。中国经济的中心在农业，农业的兴衰影响着工商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地位如次重要，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必须予以解决；第三、农民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旧中国的农民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虫害技术拙劣等天然的压迫问题”^⑪。中国社会象一座宝塔，塔底是农民。农民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和中外历史上农民参加革命的无数事例均说明农民有革命的积极性；第四、国民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援助”和参加。毛泽东这时明确指出，地主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最大对象。因为地主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若要完成这个任务，农民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⑫；第五、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使工农商学兵获得政治经济地位的解放平等，这五种人中惟农民为最多，农民获得解放的程度制约着对社会其它各阶级阶层问题的解决，不解决好农民问题其他人的问题均解决不好。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乡村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的不同特点，即乡村农民斗争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他说：“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

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⑭这是对中国革命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的较早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

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已将农民问题视为民主革命的实质和阶级基础呢？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虽然强调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性，但其精神实质仍将农民斗争看作工人运动的配合，乡村工作视为城市工作的辅助。原因如下。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统一战线中，大多数人对农民问题没有给予重视，只注意军队工作和城市工作。工农商学兵联合的口号是提出了，但理解并不一致，或只讲商学联合，或单纯强调工农兵的联合。从共产党内部讲，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以毛泽东、彭湃、李大钊为代表，坚持在农民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认为农民参加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另一种意见即以陈独秀为代表，过分夸大了农民的局限性，不愿去从事组织农民的工作。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农民是否有革命的积极性，是否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中国革命有无必要发动农民参加，而不是象后来在农民革命方式上即如何实现中国农民革命胜利的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一般思想，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农村的阶级结构、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及中外历史上农民斗争的许多事例，批驳了党内外的错误意见，指出了农民这支大军的“不可抛掉”，反复强调了国民革命如无农民的“援助”^⑮和参加就不可能成功的道理。

在此需要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固然明确指出了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事实，但仅止一点并不能形成主要依据农民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的思想。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并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许多西方国家亦存在这种现象，但在那里，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另一层含义是从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讲的。他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的大部分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的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就是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然会得出上述结论。但是，革命的目标与革命中所倚重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一回事。同样，他这里讲到的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与后来形成的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

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湘、鄂、赣、粤等省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运动的迅速兴起，冲击着几千年来专制统治的基础，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墙脚。在农民革命面前，地主阶级、国民党右派予以种种诬蔑，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施以责难和限制。同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报告》满腔热忱地歌颂了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民进行了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思想。毛泽东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而不是主要因素一引者”，因此，“一切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革命理论宝库中的光辉篇章。如上所述，《报告》是在部分省区农运猛烈兴起之后，党内外对这一新生事物众说纷纭、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发表的。毛泽东作文的着意点在于驳斥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责难，肯定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农民运动建立的功绩，视农民运动为国民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是对《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提出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识确实较前深刻。但是，总起来看，《报告》仍未能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说明农民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未能从中西方革命发生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差异的对比中说明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因而离开对农民问题的本质认识仍有一定的距离。

总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杰出地重视农民问题，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提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大革命后期，他又尖锐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这都是后来他率先树立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并找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基础。但他始终未能形成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思想。同党内的其他同志一样，他把复兴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寄托在工人阶级和城

市工作上,即使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这种思想仍表现得十分明显。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根源,其一、在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北伐战争始终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以城市工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从“二大”确定以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后,全党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城市工作上,党以公开的身份从事工人运动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农民运动虽然以广东、湖南为中心先后兴起,并在湘、鄂、赣、粤四省有较大发展,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对国民革命没有形成左右时局的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虽然在多种场合提出过,但因条件所限未能实际进行这一运动。这就使全党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受到了限制。其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已在俄国革命中得到了辉煌的证明。俄国十月革命主要依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先夺取城市的胜利,然后联合农民将革命推向全国。俄国革命的经验其时被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奉为金科玉律。党尚处在幼年时期,革命实践不长经验不多,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动力学说作出突破性发展。

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南京新军阀的高压政策下,民族资产阶级追随了反动派,做了他们的尾巴。革命阵营里只留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阶级阵线日趋明朗。

同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些说明全党已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把农民问题放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从而结束了党内农民有无革命积极性、革命有无必要发动农民参加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这是认识上统一和提高。但“八七”会议仍坚持将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城市。毫无疑义,党依靠的主要力量自然是工人阶级。当时,毛泽东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与党内的所有同志一样。8月18日湖南新省委第一次会议关于夺取长沙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即他也主张走俄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可贵的是,在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进军井冈山,从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三大起义失败后，各起义队伍先后转入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革命势力转入农村是国民党逼出来的。尽管全党在主观上未能实现革命主力由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的转变，但在实际上已走上了依据农民、以农村为依托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阐明了红色政权的理论，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基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所产生的革命性及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局限性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停止了对农民的一味歌颂，而是以客观的、冷静的目光正视在农民大量加入革命队伍后带进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现实。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一些党员干部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前途而悲观失望，一些党员富于革命积极性却流于盲目的暴动。根据地内，烧杀行为的发生，对中间阶级打击的偏重，家族观念、地方观念的严重等，均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⑮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⑯，否则其趋向必然是错误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贫农的成份”^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农民阶级二重性的论述说明，全面了解农民阶级的天然属性，是在领导农民革命中科学决策的前提，否则就不能保证革命事业健康顺利的发展，这是形成农民主力军思想不可或缺的环节。毛泽东正视这一点，说明了认识上的进步。但他认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应以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份为努力方向，则是认识上的局限，即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革命主力军之间的关系。

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场农民革命，在中外历史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⑱。毛泽东不能不受这种已为全世界共产党人所公认的历史经验的束缚。其实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此，不能从思想上冲破这种传统经验的束缚，就难以形成农民主力军的思想。那种认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

力军思想的说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随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时，全国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由于农民的支持，革命势力得到了新的恢复和发展。依靠农民，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扩大，人民军队得以组建和壮大。大革命失败后寻找城市工人阶级几经挫折的沉痛教训和在农村革命力量逐步壮大的现实的对比，不能不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认识上的飞跃。

早在进军赣南、闽西途中，红四军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共产党宣言》。两个文件根据“六大”精神，提出了民主革命三大任务和十大政纲。文件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宣言》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的主要内容，地主官僚军阀不除，中国农民得不到土地，民权革命就不算成功，“所以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责任”。文件把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作为与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列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是对中国革命双重任务和实行土地革命意义的深刻认识。

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于城市中心论的至深影响，一部分同志担心革命队伍中农民出身的分子的偏多会对中国革命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同年4月，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此进行了批评。信中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②。信中的内容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说明他当时虽然未能在理论上冲破“一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但在思想观念上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改变了那种单纯以工人成份的多少决定革命队伍性质的观念。他承认农民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主体的事实，并认为这对革命是十分有利的。这在实际上已经树立了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

同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为大会写了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决议指出，红四军内存在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其表现主要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流氓思想，盲动主义和主观主义等。这些均是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彻底清除这些思想是建设

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本要求，其根本途径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全体官兵。决议还对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系列方法作了说明。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际，在理论上解决了由穿起军装的农民组成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在农村和游击环境中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决议的思想奠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对于以农民出身的分子为主要成份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在此以前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不能科学地区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作用与农民主力军之间的关系，那么，古田会议决议的作出说明毛泽东已实现了认识上质的飞跃，即在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全国人口中，工人阶级占了少数，农民占了大多数。从绝对数量讲，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并不比俄国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数量少。大革命失败后，党之所以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是因为我们无法在城市立足，无法与工人阶级取得直接联系，客观形势逼着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而农民群众遍布全国、敌人统治农村力量的薄弱及军阀割据混战等状况，为我们实现这种转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试设想，如果党能够在城市站稳脚跟，而主动走向农村，寻找农民倚为革命主力，使革命走过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那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城市毕竟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工人阶级毕竟比农民阶级进步得多。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就是这种形势促成的。任何人的思想认识都不能超越实践许可的范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才在认识上最终实现了革命主力军由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的转变。后来，毛泽东曾对外国同志讲：“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当时，他虽然搞过农村调查，办过农讲所，但对农村“看得不深入”。只是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先生”把我们赶到了农村，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②。这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首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农民这支主力军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道路。

四

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的确立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农民主力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城市到乡村转移的思想基础。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在根据地内逐渐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但是在长期内，全党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试图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内一部分人之所以反对以乡村为党的工作重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估价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农民主力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有本量主要在于能够成为广大农民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牢固地树立了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并在理论上说明了在远离城市、远离工人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建成布尔什维克党，就为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农民既然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那么农民所在的乡村理所当然应成为革命的基地。1930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②4}。这实际上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乡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二、农民主力军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无不与农民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革命道路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民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建军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穿起军装的农民训练成新型的人民军队。建党的最大任务亦在使主要由农民分子组成的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就在根本上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使命而斗争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全党长期探索中国革命特殊发展规律并认真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农民主力军思

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又为解决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内在的思想认识基础。

第三、农民主力军思想的形成及中国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贡献。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指出，东方的革命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即以农民为基本群众，反对的不是一般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应该用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⑮。这是列宁去世前尚未解决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时期内，共产国际直到1943年解散前，也未能解决这一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关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认真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积极探索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特殊发展规律，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这就在实践上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注释：

- (1) 《红旗》，1961年第5期27页；《党史文汇》，1988年第1期26页。
- (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1集，32页。
- (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18页。
- (4.21.26) 《周恩来选集》上卷，178—179页。
- (5.6)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44—45页。
- (7)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版。
- (8) 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
- (9.10.11.13.14.15.1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128、90、131—132、95页。
- (12) 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金绍勳笔记和王首道回忆。
- (17.18.19.22.24) 《毛泽东选集》1卷，1970年版，16、73、76、99、95页。
- (23) 参见《毛泽东选集》5卷，306—307页。
- (25) 参见《列宁全集》30卷，1959年中文版，138页。